

# 苏联民族学研究史

(苏联) 托 卡 列 夫 著  
托 尔 斯 托 夫



民 族 出 版 社

# 苏联民族学研究史

（苏）В. А. 瓦西里耶夫 著  
（中）王 毅 译



民族出版社

---

# 苏联民族学研究史

〔苏联〕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著

梅 林、罗致平译



民 族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書號:1896(1)087

# 苏联民族学研究史

〔苏联〕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著

梅 林、罗致平译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安定門外和平東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7號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1958年9月北京第一版

1958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61千字 印张 2 11/16 印数:1—2,200

統一書号:3049.58

定价:0.19元

---

# 苏联民族学研究史

〔苏联〕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著

梅 林、罗致平译



民 族 出 版 社

1958年·北京

## 目 录

俄国学者对世界民族学的贡献·····托卡列夫 (3)

苏联民族学四十年·····托尔斯托夫 (42)

## 俄国学者对世界民族学的貢獻

如果文化經驗和科学成就的交流是世界科学和共同文化进步的最重要刺激物之一；那末，反之，互不往来、彼此隔絕或者諱言其他国家学者的成就，則常常是有害于科学的发展，阻撓文化的进步。当我们熟悉斯拉夫国家民族学历史的时候，这种信念就在头脑中产生了。

如果根据国外的民族学文献来判断，在那些著作中很难遇到提及俄罗斯、波兰、捷克的名字，好象斯拉夫国家几乎没有参加民族学知識的发展。这些外国著作，通常只在論及俄国各民族的民族学时，才談到俄罗斯民族学家的著作。因此，按照他們的看法，俄国民族学是純地方性的，犹如一个省的性質。当問題涉及到一般民族学問題，即涉及到基本和原則性的科学問題时，俄国学者名字的提及則尤少，这是与他們在科学上的实际作用不相适应的。

本文试图以种种具体事实指明俄国民族学沒有被关闭在狭窄的地方問題和地方任务的範圍內，俄国学者在探討民族学的共同問題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参加了世界民族学的共同发展，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超过了其他国家学者的成就。

### —

在中世紀的文献中，具体的民族学記述是那样貧乏，但早期俄罗斯文学中的某些文物却遺留下大量的神話般的故事和光輝的墨迹：如12世紀初基輔的《历代記事》，就提供了东歐平

原居民生动而真实的民族学輪廓。在这本书中有精确的部落一覽表及地方性的地理、語言分类和风俗、文化的簡明評述。还有著名的16世紀特維尔商人阿芳納斯·尼基金写的《三海巡遊記》，这本书（早于发斯科·德·伽馬的《印度的发现》三十年）对当时的印度风俗作了那样的确凿、真实而詳細的論述，即在歐洲所有的中世紀文献中也很難找到。

当一些歐洲国家走上殖民掠夺道路的时候，产生了新的作品：关于侵略者远征和水兵航海的叙述，以及被征服的大西洋彼岸国家的記載。从这个时候起，記載被征服部落“风俗习惯”的年青的民族学作品才有了一个开端。这种著述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但絕大多数的質量則相当低劣；因为它们的作者，一般而論，对被考察的民族既沒有濃厚兴趣，而又不善于和不希望了解他們的风俗和文化。然而，这些記載对于我们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仍然能够給我們介紹后来陷于衰弱的殖民地各族人民的古老而独特的文化。

16世紀末叶，俄罗斯人向烏拉尔推进，同样也是一种殖民扩张行为。但这种扩张行为并不伴随着那种殘酷地反对当地居民，象一些西歐国家在某些殖民地所做的那样。虽然地方軍政官吏和賦稅征收員掠夺了当地人民，但他們同时为了不丧失珍贵皮毛的采集者，还是竭力避免破坏地方經濟和文化組織。那些出現与俄国人深入亚洲北部和东部有关的早期民族学記載，其中有一些，也許可以說，如果与其相类似的西歐文献比較起来，則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17世紀，俄国出現了許多优秀的民族学著述，还有关于亚洲邻邦的記載。其中最杰出的当数对中国的极卓越的記載，这是1675年（？）到过中国的俄国大使尼古拉·斯帕法利（原籍为摩尔多瓦希腊人）撰写的。他的巨著《亚洲世界記实上編，

中国及其城市与省》●对中国人民生活各方面报导的詳实和丰富，着实令人吃惊，它至今仍是一本关于中国民族学不可缺少的資料。另外还有一本优秀的著作，即格里戈里·諾維茨基的《奧斯加克人簡述》（1715），这是純民族学专論中最早的世界文献之一。这本論著虽然比較簡短，但著者不仅闡明了奧斯加克人（汉提）的信仰和各种风俗，并且还闡述了他們的物質文化、家庭生活和政权組織等等，同时，他还提出了这个民族的起源問題●。

18世紀俄国和世界民族学文献中最杰出的作品是斯捷潘·柯拉舍宁尼科夫的《堪察加地方志》（1755）。这个俄国天才的研究家的著作，即在今天，我們仍不能不为著者認識自己任务的深刻和严肃，以及記載的詳实而惊异。这本著作問世以后，不仅馬上吸引了俄国学者的注意，同时也吸引了外国学者的注意。不久，即出現了这个古典作品的英、德、法、荷兰四种文字的譯本●，并且給予西方民族学以后的发展以重要的影响。

● 恩·弗·卡塔諾夫出版，喀山，1910年。

● 格·諾維茨基的材料在当时即聞名于西歐，其手稿摘要于1720年由叫做伊奧干·邁列尔这个人刊印于柏林。这个人在此以前，曾因被俘而居于托博尔斯克，所以他能看到这部手稿（参閱：Joh. Müller, *Leben und Gewohnheiten der ostjaken*, Berl., 1720）。材料全文后再版于弗·魏别尔文集（Fr. Weber, *Verändertes Russland*, Frankf.—Lpz., 1744）。其后又被編入著名的斯特拉林别尔格的書中（斯德哥尔摩，1730）。格·弗·米列尔在他的《西伯利亚史》一書也运用过諾維茨基的材料。但是这些作者没有一个人提到格里戈里·諾維茨基的名字。諾維茨基的《簡述》原稿于1884年始得出版（烏伊科夫出版）；1941年再版于新西伯利亚。

● 關於这方面可参閱阿·伊·安德列耶夫：“柯拉舍宁尼科夫著作《堪察加地方志》的譯本”（《苏維埃北方》——紀念柯拉舍宁尼科夫論文集，列宁格勒，1939年）

綜上所述，俄国学者很早以来就对各个民族生活特点的研究，表现出濃厚的兴趣，并且对这些特点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俄国所出現的最初的民族学調查大綱，正是具有这样的特征。

这些大綱中最早的——大概是世界科学历史中的首創——是1734年由卓越的俄国学者、历史学家弗·恩·塔奇舍夫編写的。这是关于西伯利亚历史、地理的問題汇编。塔奇舍夫是通过西伯利亚及伏尔加河沿岸諸市、省办事机关分发出去的。当时他由于職務关系，与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有所接触。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是帶有純民族学性質的。在塔奇舍夫增补后的这个調查表（1737年）中，共罗列了198个問題。根据这个調查表所收集到的資料，曾經轉交給科学院●。不久，科学院就編撰了一个簡明而有趣的提綱手冊。格·弗·米萊尔和他的同事們——1733—1743年科学院考察大队隊員●——就根据这个提綱手冊进行收集民族学历史材料。

这个提綱中問題的性質使人認識到科学院理解俄国民族学研究任务所达到的高度水平。这个手冊的編写人向考察队的参加者建議：“特別要考察……每个民族的疆界，以及起源相同和各族中不同民族相互溶合后所存的界限如何？抑或界限泯灭。”手冊中还建議收集每个民族的民族傳說：“根据各該民族的傳說，每个民族的起源如何？每个民族古老的住屋、村落、職業及其他如何？”

● 阿·伊·安德烈耶夫：“塔奇舍夫關於西伯利亚的著作和資料”，《苏維埃民族学》，1936年，第六期，第93—94頁。

● 格·弗·米萊尔：《西伯利亚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7年，第460—461頁。

宗教、風俗、語言等問題關係着人類起源：“每個民族有何種宗教，他們是否崇拜自然？”“應該注意民族、家庭和婚嫁等方面的風習和儀禮”。這個提綱手冊中還要求蒐集標準語言，並建議在記錄地方名稱時採用準確的標音：“應該根據各該民族及其鄰近民族的發音，記錄每個民族、國家、河流、城市等名稱，假若可能的話，應再探索名稱的淵源。”米萊爾自己為他的助手伊·埃·菲謝爾所編寫的一個提綱手冊是非常完美的<sup>①</sup>。這個提綱手冊羅列了一千多個關於被調查民族生活各方面的問題。米萊爾在這個提綱手冊中形成了他對民族學調查目標的觀點：根據他的話說，民族學調查有益於歷史，因為它可以从風俗、語言的共同性中指出各民族相互的血緣關係——這種觀點証明了當時對民族學任務的極其深刻的理解。

塔奇舍夫對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历史、地理研究任務的科學觀點，在本書中有專文論述<sup>②</sup>。塔奇舍夫提出，即使沒有文字記載也應研究每個民族歷史的問題，研究民族的“變異”（即民族起源），並要注意研究作為民族分類標志、作為考察各民族之間歷史關係資料的語言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在18世紀科學院考察大隊的時代，俄國民族學研究已經在系統地進行，並且是在相當高的方法水平上進行的。

但是要談到有計劃和有步驟地進行民族學調查，那應該是屬於另一個比較晚的時代——19世紀中葉。僅在當時俄國地理學會（成立於1845年）成立後，才領導這個工作的組織。這個學會的民族學分會的活動，特別是在始創的十五年，對世界民族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誠然，不應該忘記，地理學會的領導

① 刊於《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彙編》，第1卷，聖彼得堡，1900年。

② 參閱恩·恩·斯切潘諾夫的《塔奇舍夫與俄國民族學》。

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自由资产阶级阵营；但是学会的活动却以其规模、深度，提出任务的严肃性和获得成果的丰富而著称于世。

虽然俄国地理学会及其民族学分会的成立，比较德国（1828）法国（1839）、英国（1843）的地理学会成立的要晚，但是上述这些国家里的学会，远远不能如俄国地理学会和民族学分会那样开展广泛的、有计划和有成效的蒐集活动。俄国地理学会的创办人特别强调国家的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在学会成立起因（1845）的报告记录中曾专门谈及。

民族学分会从头几年起，就积极进行民族学材料蒐集活动。1847年编印七千份特别大纲（即通告），散到地方去，其中包括有居民体型、语言、物质和精神文化、传说、古代文物等问题。这个大纲的作者是参加民族学分会领导的比较有名的恩·伊·纳德津。1848年又编印了一个新的、扩大了的大纲，以搜集各种民族学材料。学会的领导人向俄国一切有知识的人们发出呼吁，希望根据本大纲搜集和寄发各地方、地区、村庄的民族学记载。这个号召并没有落空。从各个角落寄来了几百份各县、乡、村人民的生活、风俗、信仰的记载。在大纲发出后的五年，学会的领导人手中已积累了这样的记录达两千余份。经过恩·伊·纳德津和克·德·卡沃琳的整理和编纂，其中优秀的资料不久就相继刊行。于是《民族学资料汇编》丛书，从此问世（1853—1864）。但这套丛书以后为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地理学会民族学分会札记》的刊物所代替。

地理学会并不仅限于用这种比较消极的形式搜集民族学资料，它还组织了許多专门考察队进行工作。最大的考察队是在波·波·楚宾斯基领导之下的“俄罗斯西部边区民族学综合考

察队”（1860年末）。

这种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民族学资料的方法，规模宏大，几乎是在全国的辽阔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是在学会的学者领导之下，以有理论修养的专家为首（即使是自由资产阶级倾向的专家），并吸收地方知识分子中自愿参加的广大人士进行的。无可置疑，它是当时民族学研究的最新方法。

### 三

俄国民族学家“田野”工作及其蒐集具体事实材料的主要场所，当然是俄国和其各族人民。他们在这方面的功绩自然是无可否认的。俄国学者也为科学开拓了一个完整的广阔天地——居住在占地球六分之一以上地面的数十种民族的生活和文化。

但是俄国学者在研究国外许多民族方面的功绩也是非常伟大的。特别是在研究与我国接壤的中亚、东亚国家的民族学方面，做的更多。俄国研究家在研究中国的伟大文化及其各民族的生活方面，不少于西欧学者所投入的力量。只要回忆一下俄国传教士学者——俄国驻北京教会使节团团员们——多年而有成效的活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团员中首屈一指的，当数伊阿金夫·比丘林，他是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伊阿金夫以他多年不倦的对中国历史民族学资料的劳动，独自一个人翻译了这些资料并直接、有系统地加以钻研，编撰成自前汉起至19世纪止，这整个时间内记载中亚、东亚国家的全部丛书。我们还记得他的著作，如《关于古代中亚各民族的资料汇编》（3卷，1851年）、《西藏与青海历史》（2卷，1833年）、《额鲁特或加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833年）、《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1829年）、《蒙古札记》（1828年）以及其他许

多著作。而对民族学家最感兴趣的著作是《中国社会与道德状态》（4卷集，1848年）。比丘林翻译和汇报的中国资料，迄今仍为研究中国和中心亚细亚的历史家和民族学家不可缺少的最珍贵的参考书。

在这一方面，另一个传教士学者、教会使节团员帕拉季依·卡法罗夫，也有不少的著作。他的著作和翻译的遗墨中最重要的是著名的关于成吉思汗的“秘史”（元朝秘史）。“秘史”发表于《北京俄国教会使节团团员著作集》第4卷（1866年），这是报导12世纪—13世纪蒙古人民生活的珍贵资料。

中心亚细亚地区——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学，西欧科学是很少涉及到的，主要是伟大俄国旅行家，如恩·莫·普尔热瓦里斯基、格·恩·波塔宁、阿·莫·波兹德涅耶夫、莫·弗·彼夫佐夫、普·克·科兹洛夫、格·耶·格鲁姆·格尔日马依洛及其他等人的著作，为世界学者开拓了这个地区。这些旅行家各自提出不同的目标：有些学者致力于地理学的阐述，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古代碑文、手稿等等；然而他们都对中心亚细亚各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没有我国研究家的英勇劳动，没有他们克服蒙古干旱沙漠和西藏严寒高原的非凡困难，世界科学将很少知道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

俄国学者对大西洋彼岸国家各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只要回想19世纪初，俄国环球航行参加者的著作中关于大西洋彼岸各民族非常有趣的民族学材料，就足以证明，如伊·弗·克鲁普什帖尔恩和尤·弗·李辛斯基之于夏威夷群岛、马贵斯群岛、帕斯哈岛（1803—1806），弗·姆·戈洛夫宁之于塔纳等岛（1807—1809），奥·耶·科采布之于塔希提岛、马绍尔岛和夏威夷群岛（1815—1817，1823—1826），

弗·普·李特克之于加罗林群島（1827—1828）等●。

俄国研究家对于1867年前属于俄国管辖的美洲西北部各民族的材料，也是丰富无比的。在俄属美洲最活跃的研究活动时时期是1830—1840年，当时是俄美公司活动的全盛时期，这之前，经济利益已由开发下阿穆尔河流域转到美洲。在这些年代，有阿·弗·卡舍瓦洛夫、克·特·赫列布尼科夫、弗·普·弗兰格尔的旅行札记和著作，到今天已很少被提到和评论了。但伊·耶·温尼阿米诺夫——19世纪最卓越民族学家之一——的研究论文，以及勒·阿·扎戈基金、伊·格·乌兹尼先斯基等人的考察报告最有价值。如果美洲西北部的开发应该归功于18世纪俄国考察队，那末美洲西北部各民族，特林吉人、阿列乌特人、卡季亚克茨人、西部埃斯基摩人的民族学研究的功绩，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应该属于俄国学者。这是那些利用俄美古典时代科学遗产的现代美国研究家所一致承认的。

在这些遗产中，最出色的当然是伊·耶·温尼阿米诺夫的著作。他的《乌那拉斯克群岛札记》（1—3卷，1840年），就其内容的详实和丰富来说，不独是罕有的专门论文，并且在理论水平方面也是很高的。他以冷静真实的态度对待材料，以善良的心怀探求人的心理和风俗习惯，细心钻研各族人民的语言；对人民寄予诚挚的同情，但不虚构美化；了解自然环境的作用和“教养方式”，即文化传统的作用，又善于区分古老的独特现象和由于接触俄国人所引起的新事物；关怀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甚至在更晚时期的许多民族学研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

俄国学者对大西洋彼岸国家的其他著作中，我们要提出一种不仅是事实材料珍贵，而且就科学方法的观点说也是具有重

● 参阅本卷，伯·阿·里勃舍茨：“19世纪上半叶俄国环球考察的民族学研究”。

大原則意義的，這就是恩·恩·米克魯霍—瑪克拉依的著作。

這位卓越的人道主義學者、勇敢的旅行家和天才的研究家的活動，是使俄羅斯和世界科學可以自豪的人物。米克魯霍—瑪克拉依以他在大洋洲和印度尼西亞的多年考察，對歷史科學提供了最新的流派。姑置米克魯霍—瑪克拉依的寶貴的自然科學著作不論，單就他對人類學的探討說，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幫助人類和人種起源的同源觀點戰勝了反科學的種族主義理論。

至於談到米克魯霍—瑪克拉依關於民族學本身的著述，首先必須注意到他是一個嶄新的田野民族學工作方法的先鋒。這個勇敢的考察家，不怕獨居于負有殘忍的吃人者名聲的新几內亞土人中間，不怕走上以前白人足跡所未到過的海岸，並和土人同住了許多月，同他們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研究了他們的語言，還給他們做了許多工作，但科學觀察卻從未間斷。

米克魯霍—瑪克拉依以事實證明這種民族學工作方法不僅符合於人道主義的原則，即使從純科學態度看來，它比武裝考察和以兵艦作短期訪問的海上旅行家的觀察所得也多得多。誠然，在這方面，傳教士是俄國學者的先驅。這些傳教士經年累月地獨居于當地人民中間，研究他們的語言；但是他們所追求的完全是另外一些目的，而這些目的，少有例外，有害地反映在他們觀察的科學結果上。瑪克拉依則是第一個科學家，他以純科學的目的從事艱難危險的、新型的、“固定性的”民族學工作的實驗，而且這個實驗獲得了光輝的成就。

米克魯霍—瑪克拉依的民族學著述的成績，在數量上雖然並不多——因為這位早年犧牲的考察家的許多資料未及刊行于世，但是他的材料對於科學卻具有兩方面的價值：首先是事實記載的可靠——因為俄國考察家的良心不允許他記述，尤其是發表那種用他所不信服的舊的科學觀察方法所得來的材料，其

次是他善于表达土著生活的具体而生动的画面。

米克魯霍—瑪克拉依的著作，不同于其他許多俄国学者的著作，这是歐美学者所熟知的。瑪克拉依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材料的极大部分，因而这些材料不能不給予世界民族学以影响。

#### 四

为了不再进一步轉向田野民族学工作和蒐集資料方法諸問題，現在要提一下固定性的考察方法，即长期地停留在被研究的部族中間，热心地研究他們的語言；在撰写科学著作的同时，不忘对居民进行实际的帮助。这种方法，在米克魯霍—瑪克拉依之后，又为俄国民族学家所詳細研究成功地运用。在这种方法的探索中，政治流放者以及专制时代在遙远的非俄罗斯居民的北方地区度过多年的革命者研究家的功績是非常之大的，这就出現了许多关于西伯利亚和北方各民族的民族学著作：如伊·阿·胡嘉科夫、斯·弗·科瓦里克、弗·姆·伊奧諾夫、恩·阿·維塔雪夫斯基、勒·格·列文塔尔、弗·普·馬依諾夫、弗·夫·特洛善斯基、勒·亞·什捷尔恩別尔格等人的著作。在这些研究家中还有波兰的流放者——起义者和革命家：謝罗雪夫斯基、斯·弗·亚斯特列姆斯基、菲利克斯·孔恩。这些民族学家中的某些人，如波哥拉茲、伊奧海里遜等人以后在与美国学者研究亚洲、美洲人种文化关系的《哲祖波夫斯基北太平洋考察》大部头著作的合作中，貢獻出了他們的經驗和知識。这本巨著的材料在民族学文献中不失为一个重大的貢獻。

这种老的革命民主主义民族学及其具有特征的固定性的田野工作方法的光荣傳統，通过波哥拉茲和什捷尔恩別尔格滲入